



學苑出版社

二十世紀疑古思潮

三月出版

中華民族十五卷

伏甄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古史辨

主編

吳少珉
趙金昭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吴少珉、赵金昭主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ISBN 7-80060-246-X

I. 二… II. ①吴…②赵… III. 中国-古代史-史学流派-研究 IV. K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586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68279295

E-mail: xueyuan@public.bta.net.cn

E-mail: guoq2008@sohu.com

永清印刷厂印刷

890×1240 32 开本 20.25 印张 410 千字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定价: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时代条件、学术渊源和思想意义	(1)
第一节 古史辨派与“五四”反封建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关系	(1)
(一)“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1)
(二)在西方近代科学观念与中国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古史辨派成为中西学术交融的产物 ...	(15)
第二节 传统学术中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	(21)
(一)传统史学中疑古辨伪思想的深远影响	(22)
(二)古史辨派对传统学术中疑古辨伪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31)
第三节 晚清今文学派疑经辨伪思想的影响及经学子学的互动	(71)
(一)晚清今文学派疑古辨伪思想对古史辨派的影响	(71)
(二)经学与子学互动激发了学术界解放思想的勇气	(85)

第四节 古史辨派与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	(95)
(一) 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传入,更新了人们的 思想观念	(95)
(二) 美国实用主义史学方法对胡适、顾颉刚的 影响	(102)
(三)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	(106)
第二章 古史辨派的学术成果,若干问题的分析 和总结	(112)
第一节 顾颉刚的《中国辨伪史略》	(112)
(一) 文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15)
(二) 继续轻易使用默证	(119)
(三) 关于史官之作与民间传说	(120)
(四) 关于“移置法”的运用问题	(121)
(五) 关于“三重论证”问题	(124)
(六) 关于古代神话问题	(128)
(七) 关于造假运动问题	(129)
(八) 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	(134)
(九) 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估计	(138)
第二节 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	(141)
(一) 主要观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143)
(二) 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	(150)
(三)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 和历史〉》	(155)

(四)杨宽《刘歆冤词》	(158)
(五)“意为进退”的“班马异同法”	(162)
(六)关于“时代思潮”问题	(175)
(七)关于经学及今古文传统问题	(182)
(八)关于史科学定位问题	(203)
第三节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与顾颉刚、童书业 《夏史三论》	(210)
(一)《三皇考》的主要论点及若干问题	(211)
(二)《夏史三论》的学术倾向及所存在的问题	(225)
第四节 顾颉刚的《尚书》研究	(244)
第三章 古史辨派与 20 世纪学术史:几种视角的 考察	
第一节 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异同	(263)
(一)胡适与古史辨派	(263)
(二)胡适“缩短”“拉长”两阶段说	(267)
(三)胡适与顾颉刚的学术异同	(284)
第二节 顾颉刚的上古史研究:以先商王亥问题 为例	(299)
第三节 疑古与考古的互动:顾颉刚对考古学成果的 运用	(313)
(一)提出“层累说”与古史辨派创立时期	(317)
(二)提出“战国秦汉造伪说”时期	(349)
(三)依据甲骨文论证古代不是黄金时代	(358)

(四) 建国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359)
第四节 从古史研究到神话学研究:以杨宽《中国上古 史导论》为例	(370)
(一) 杨宽与古史辨派的学术关联	(374)
(二) 考古学及史观派的学术背景	(383)
(三) 杨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方法	(388)
第五节 古史辨派与辨伪学:梁启超、钱穆、罗根泽、 张心澂的文献考辨	(399)
(一) 总结与奠基——梁启超辨伪理论成就	(399)
(二) 钱穆与古籍考辨	(414)
(三) 罗根泽、张心澂的辨伪成就	(430)
第六节 “疑古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	(439)
(一) 冯友兰“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说	(439)
(二) 顾颉刚“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说	(444)
(三)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说	(446)
(四) 由胡适“剥皮主义”与钱穆“高山下石”之喻反思 梁启超“先秦学古学界第一之位置”	(451)
(五) 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阶段说与梁启超四阶段 说的对应关系	(457)
第四章 20 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嬗新:对古史辨派作用 与局限的检讨	(464)
第一节 20 世纪后半期学术新趋势的若干特点	(464)
第二节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514)

(一)关于《左传》和《周礼》的新发现	(521)
(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	(527)
(三)关于《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的争论	(530)
(四)《文子》的真伪之争	(534)
(五)关于《鹖冠子》、《六韬》的真伪问题	(537)
(六)对《孔子家语》的新看法	(541)
(七)对《晏子春秋》的再认识	(543)
(八)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订正史书记载的 讹误	(547)
(九)银雀山汉简与马陵之战	(550)
第三节 “重建古史”与“走出疑古时代”	(555)
(一)李济的古史重建活动	(559)
(二)徐旭生的古史传说研究	(571)
(三)张光直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	(577)
(四)苏秉琦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	(585)
(五)李学勤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与 “走出疑古时代”	(590)
(六)林甘泉对“疑古”和重建古史体系的看法	(593)
第四节 关于上古历史的最新探讨及其前景	(596)
主要参考文献	(620)
后 记	(631)

第一章 古史辨派的形成： 时代条件、学术渊源和思想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产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它萌生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母体，饱受了新时代丰富的精神滋养，并最终成为一个勇于打破传统的圣贤崇拜、廓清附会杜撰的古史迷雾的学术流派，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 20 世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古史辨派与“五四” 反封建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关系

（一）“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时代潮流 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带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传统学术无法给予的，而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

运动这一由旧转新的时代所赋予的,中国近代史上这三次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古史辨派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生于苏州。这里是东南文化名城和清代乾嘉学派“吴派”的中心,而顾氏家族也是江南颇有名气的读书之家,康熙下江南时,曾誉称顾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顾颉刚从小就培养起与别人颇为不同的读书求学的志趣,这成为其日后从事古史辨伪的思想源头。顾颉刚很小就接受了启蒙教育,据说,他在坐“连台交椅”时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了,3岁时其母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6岁时进私塾较系统地学习经史知识,大部分经书都已读过。14岁时,他进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这一时期他受到的是正规的传统教育,在祖父、叔父和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国学基础。这种传统学术的教育和熏陶,直到他进入新式学堂后也没有停止。两年后顾颉刚求学于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此时,他仍继续着古典经籍的学习。每天晚上回家后,其祖父都要教他读《尚书》和《周易》,使他对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新式学堂中博物理化等课程又启蒙了他的科学的观念,使他在研究学问的思想方法上得到了一定的训练。

顾颉刚少年求学时期,正是晚清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最早接触到的时代思想就是戊戌维新思潮。当时,顾颉刚的父亲参加了维新组织强学会苏州分会的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苏州分会自动解散,会中书籍由各个会员携取回家,父亲分得《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万国演义》等书,嗜好读书的顾颉刚

尽情翻阅,接触到一些世界史。其父还把光绪皇帝和康、梁及六君子的照片挂在墙上,顾颉刚“常常看着,对这一班失败的英雄致敬,因此也就痛恨了西太后”^①。受父亲影响,尚处于孩提时代的顾颉刚关心国家和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并阅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和报刊,像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就是他的日常读物,其中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篇鼓舞着他的爱国热情。但顾颉刚此时还是倾向保皇党的,由于对革命派的了解甚少,加之自幼读经书,对古帝王古贤臣的崇拜由来已久。“要说国家可以没有皇帝,仿佛说一个人可以没有头,在我们的想象中是断然想不出来的。”^②戊戌维新思想是以广泛地引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为基础的,它对仍以封建思想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各地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新学得以广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得到了发展。因此在顾颉刚的知识领域里,既有传统学术的内容,也有新学的内容,这种知识结构为他日后进行古史辨伪打下了坚实基础。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顾颉刚又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看到日俄两国军官在我国境内耀武扬威的样子,以及在战争中被杀害的无数中国人民,他气愤已极。正当此时,国内革新运动勃发,少年顾颉刚“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在这种热情的包裹之中,只觉得杀身救人是志士的唯一的,为政济世是学者的唯一的

①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②同上,第15页。

责任”^①。而报刊杂志上的革命宣传,更使他体会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革命的必要。如顾颉刚对《国粹学报》爱不释手,据他自己讲,此学报“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借了‘国粹’一名宣传革命,洗涤了《新民丛报》给我的保皇思想”^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顾颉刚“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③。当时上海的报纸每天下午一点运到苏州,由于他身高腿长,走路快,于是常常在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被同学们派去买报。他还参加学团和巷团,彻夜巡逻,防御土匪,置身于革命洪流中。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反传统文化的言论也随之出现,这种文化革命的思想汇成辛亥革命期间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为后来大规模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顾颉刚的思想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关注国家的命运,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一些活动。1912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党,担任苏州支部的文书,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平时常与王伯祥、叶圣陶讨论社会主义,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言乃专制帝王之脚本。1913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的预科班,自此至1923年,他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渡过,这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形成最为关键的10年。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立刻援引《新青年》主编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②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0页。

③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见《中国哲学》第九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18页。

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努力打破学校中的陈腐风气,锐意改革校政学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广泛延请人才,成为当时校政整顿的关键,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机运。这一时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职的,“《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①,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北京大学积极宣传民主、自由,倡导新文化,同时兴起了一股批判旧的思想文化的浪潮,使北京大学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1916年至1920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这正是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年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其锋芒直指反动派极力维护的孔子的权威。民国初年以来,从袁世凯复辟,到张勋复辟,尊孔复古的反动逆流十分强劲,这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的痛击。1916年8月国会复会后讨论孔教应否列入宪法,这更引发舆论界的激烈论战。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②等文中,指出了孔子学说的封建性质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李大钊还明确地指出: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③。于是,

①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页。

②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7页。

③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呼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碍于新思想、新文化发展的因素进行无情的批判,力图打破人们头脑中对传统圣贤、封建思想的迷信,为宣传新的思想文化扫清障碍、开辟道路。感受着这一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顾颉刚的思想才智得到了真正的解放。1918年,他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张宣传新文化的一个学生组织“新潮社”,经常作文抨击旧的封建文化,阐述和介绍新的思想观念,发表在与《新青年》齐名的《新潮》杂志上。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其涉及的领域也从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深入到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重新审视和评判,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深入到了学术研究领域。

而胡适执教于北京大学,更对顾颉刚一生的治学乃至古史辨派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多次谈到胡适对古史辨派史学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作用。1917年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接替陈汉章讲授《中国哲学史》。陈汉章是章太炎的弟子,旧学渊博,他从伏羲画八卦讲起,旁征博引,漫无边际,讲了一年才讲到商朝箕子陈《洪范》,使学生不得要领。胡适与其大相径庭,他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重编讲义,用《诗经》作时代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曾回忆当时的感受:“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折而不能下。”由于胡适刚留美归国,年纪轻轻,因而学生对其颇有怀疑和不满。但善于思考的顾颉刚却感到耳目一新,听了几堂课便被胡适的系统性和条理性吸引,他对同宿舍的好友国学门学生傅斯年说,胡先

生“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①。胡适虽然只比顾颉刚大两岁，但顾氏对他“截断众流”的勇气和学识十分钦佩，深受其存疑主义的启发，挖掘中国历史上怀疑古书古史的思想，在更新旧的史学观念、汲取新的研究方法上得到许多教益。胡适留美时师从杜威，并将其实验主义演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大力鼓吹，风靡一时。胡适是“新潮社”的顾问，“新潮社”的活动“很受他些指导”^②。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高潮中，胡适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他们“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他们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他们“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所以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认为对旧有的学术思想应持一种评判的态度，重新评估其价值。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6页。

②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具体的步骤是,第一步进行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及其影响效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看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在胡适的具体指导下,“整理国故”的运动在学术界全面兴起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在他的旗帜下走上了这条道路。顾颉刚对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持批评的继承的态度,胡适的主张很契合他的理性,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整理国故”队伍中的积极分子,事实上,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正是在重新评判一切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的。“五四”以后,胡适一方面重提“整理国故”的口号,一面又办了《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两个发表辨伪成果的刊物。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但不先弄明白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②整理国故运动不仅提出了辨伪的任务,还提供了古史考辨的阵地,有效地帮助古史辨派的先驱者摆脱儒家经学的羁绊,破除对古史的迷信,把古史和古书中崇拜的偶像,变成重新评判的研究对象,促成了古史辨派思想的酝酿和产生。整

^①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2-533页。

^②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第3页。

理国故运动,因其本身所具有的怀疑主义的性质,自然而然地成了现代疑古思想的原动力,对此顾颉刚曾多次谈起:“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画。我生当其顷,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于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①正是在“此种空气之下,踊跃用命,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②。

1920年顾颉刚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员,这对他后来的古史疑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顾颉刚与胡适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他常为胡适搜集资料,和他商榷学问,交流心得,领会其研究历史的方法,接受胡适思想的浸润和影响。如他将自己的《清代著述考》稿本送与胡适参阅,胡适看过后大为欣赏,认为“这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③被顾颉刚抓到了。但也回信指出其中没有列入姚际恒的著作,认为姚际恒是一个很大胆的应当表彰的人^④,引导顾颉刚标点姚的《古今伪书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胡适的这一提议竟成为古史辨派产生的契机。后来胡适回忆道:“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78页。

②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③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古史辨》第一册,第4页。

④胡适:《询姚际恒著述书》,见《古史辨》第一册上编,第1页。